

『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

陈永祥 著

美援外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SSAP)

# 「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

陈永祥 著

## 美援外交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SSAP)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陈永祥著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10

ISBN 978 - 7 - 5201 - 5207 - 5

I. ①英… II. ①陈… III. ①中英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1931 - 1945 ②中美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1931 - 1945 IV. ①D829.561 ②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0543 号

---

## “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

著 者 / 陈永祥

出 版 人 / 谢寿光

组稿编辑 / 郑庆寰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文稿编辑 / 徐 花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22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5207 - 5

定 价 / 89.00 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美派’外交官群体与国民政府的美援外交研究（1931～1945）”（项目编号：12BZS041）最终成果

#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初登国际外交舞台的“英美派”外交官	006
第一节 晚清留学潮流与“英美派”外交官之缘起	006
第二节 巴黎和会上“英美派”外交官争取美援之努力	010
第三节 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派”外交官争取美援之成效	019
第二章 中日民族矛盾加剧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之展开	032
第一节 列强在华争夺与南京国民政府走向亲美	032
第二节 中日民族矛盾加剧与“英美派”之形成	046
第三节 “英美派”外交官的群体特征	064
第四节 全面抗战爆发前“英美派”争取美援之努力	070
第三章 全面抗战爆发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之提升	093
第一节 抗日战争初期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093
第二节 远东战局发展与国民政府外交重心之转移	103
第三节 蒋介石对“英美派”外交官之重用	108

第四章 战时美援外交之主要成效·····	120
第一节 促成美国对中国的租借援助·····	120
第二节 接洽美国军事使团与史迪威将军来华·····	133
第三节 争取美国重视中国的战略地位·····	143
第四节 争取美国提高中国的政治地位·····	154
第五节 争取美国加大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172
第五章 “英美派”外交官美援外交风格之比较·····	183
第一节 在美援外交上的各自优势·····	183
第二节 在美援外交共事中的和谐与龃龉·····	194
结 语·····	209
主要参考文献·····	211
附 录 英汉人名对照表·····	223
后 记·····	228

## 绪 论

清末民初的留学潮流对 20 世纪中国内政外交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即是“英美派”的出现。“英美派”因其具有留学英美的背景，自然深受英美文化的熏染，故回国后在内政外交特别是外交上带有明显的亲英美倾向。由于英国是在华拥有巨大利益的欧洲大国，且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往往一致，故“英美派”又叫“欧美派”或“亲美派”。

“英美派”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很难做具体的统计。客观事实是，“英美派”曾广泛分布于国民党政权的政界、外交界、金融实业界及文化界诸领域，尤以外交界和金融界居多，故有学者认为，“英美派”概指“一批职业外交政客与金融买办之流”。<sup>①</sup> 广义地说，凡是在外交上带有亲英美倾向、在政治上主张走英美路线的人，均可纳入“英美派”的观察视域。

“英美派”外交官的初步崛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而“英美派”外交官群体，则是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加剧而形成的。

“英美派”外交官生活的时代，正是近代中国发生历史巨变的时期。辛亥革命后，实现民族独立、谋求国家富强成为中国民众的强烈呼声。中国是一个积弱积贫之国，面对列强的欺凌，不仅必须“唤起民众”，提升全民族

---

<sup>①</sup> 傅德华：《民国政海名流归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 292 页。

的自觉度与自信度，以武力抗击外敌的入侵，而且需要外交官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据理力争，确保和收回应有的权益。“英美派”外交官就是在民族危难之际应运而生的，他们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肇始于其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的出色表现——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凡尔赛和约》、促签《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等，都表现出敢于为争取国家独立自主、收回应有权益而奋力拼搏的顽强精神与宏大抱负。

“英美派”外交官大多以学者之身份涉足外交界，在国内深受社会各界的尊敬。他们一般不介入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的争斗，能抛开党派成见，保持某种超然之姿态，故每当各派政治力量势均力敌难以平衡时，他们常常能够成为各派共同接受的对象，如施肇基、颜惠庆、顾维钧、傅秉常、王正廷、王世杰、王宠惠、罗文干、郭泰祺、胡适等，或当过驻重要国家的外交使节，或担任过外交部的总长或部长，或出任过国务总理乃至摄行过总统职权，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过不同寻常的作用。“英美派”外交官留学欧美的经历，其学养学衔以及学者兼外交家的身份，亦使其易于为国际外交界所接受，便于其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长袖善舞，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施展其才华智慧。

在对外关系中，争取与国的支持是一种常见的外交手段。美援外交是民国外交史上的重要篇章。20世纪30~40年代，“英美派”外交官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争取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而采取过诸多外交举措。从形式上来看，美援外交既包括争取美国的道义援助，如舆论上的同情、外交上的声援等，又包括获得美国具体的实际的援助，如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政治支持、战略重视等诸多方面。全面抗战爆发前，美援外交无论其形式还是效果均主要体现在争取美国的道义援助上。全面抗战爆发后，美援外交的重点则转向争取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政治支持，以及对中国战略地位的重视上（包括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其亲英美倾向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而日趋加重。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英美派”外交官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上，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真相、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与声援中国而奔走效力，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远东战局的发展，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转向美国，美援外交在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中占据首要地位。而美援外交政策的执行和美援外交活动的展开，则主要是通过国民政府内部的“英美派”外交官来实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亲美程度可以从“英美派”外交官的美援外交中反映出来。“英美派”外交官在争取国际社会的舆论同情，促成美国在经济上、军事上援助中国抗日，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签署中美、中英新约，争取美国重视中国战略地位，筹创联合国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将“英美派”外交官置于近代中外关系特别是中国抗日战争全局这一广阔视野里，全面考察“英美派”外交官与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关系，揭示“英美派”外交官在国民政府美援外交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而审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广度与深度，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而对这样一个人数多、影响大的“英美派”外交官群体进行综合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深化近代中国外交史特别是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可为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研究特别是中美关系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迄今为止，学界对“英美派”外交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宋子文、胡适、顾维钧等几个重要代表人物，业已出版的有关著作，对美援外交也有所涉及。<sup>①</sup>

① 涉及这一研究的重要著作有：美国学者迈克尔·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赫伯特·菲斯（Herbert Feis）的《中国的纠葛（1941~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重庆出版社，1994），罗斯·凯恩（Rose Koen）的《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商务印书馆，1984）；我国台湾学者陈立文的《宋子文与中国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董霖的《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傅启学的《中国外交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王正华的《抗战期间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大陆学者吴景平的《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宋子文政治生涯编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宋子文思想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民国时期的大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石源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中国十外交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任东来的《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1937~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高克的《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外交官生涯片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岳谦厚的《顾维钧与抗日外交》（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彭小舟的《近代留美学生与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齐锡生的《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等等。

这些既往研究成果为笔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启示。笔者在经过学术史梳理后发现，以往学界对“英美派”外交官的研究仍有深入挖掘与拓展之空间。以往研究具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没有将“英美派”外交官作为一个整体（群体）来进行考察，特别是未能从近代中外关系发展演变的全局角度来进行审视，因而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二是研究视角主要局限于“英美派”外交官的具体外交实践，而对“英美派”的缘起和形成过程，“英美派”与“亲日派”在国民党政权内的力量消长，“英美派”外交官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英美派”外交官的政治抱负，“英美派”外交官在美援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英美派”外交官重要代表人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外交思想、外交立场和外交风格之差异，以及“英美派”外交官的群体特征等诸多问题，缺乏深入的探讨，因而难以在理论上有大的突破。因此，本书期望对这些问题再做探讨。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归因于全民族同心同德、浴血抗战，其次也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14年艰苦漫长的抗日岁月里，与硝烟弥漫、炮火连天、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战场相比，外交舞台上的你争我斗因无血腥之味，似乎大为逊色，但也不乏唇枪舌剑、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波谲云诡的惊险场面，其激烈与复杂之程度，丝毫不亚于真正的战场。正如顾维钧的美国导师约翰·穆尔（John Moore）所指出的：“外交即战争，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只是武器不同而已。”<sup>①</sup> 抗战时期的中国外交谱写了许多辉煌的篇章，而美援外交又是国民政府战时外交之重点，本书期望以远东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全局为背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层面，全面考察“英美派”外交官的美援外交活动，揭示国民政府美援外交的实际成效，进而审视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关系。

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建基于翔实可靠的材料。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以辩

---

<sup>①</sup>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第396页。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图借鉴前人和时贤已有成果，努力挖掘和爬梳新材料，在占有翔实材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得出合理科学的结论。

除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外，本书还借助外交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的某些分析方法，关注中美外交政策制定的内外环境与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围绕抗战时期的美援外交这一整体目标，试图讨论如下一些具体问题：考察“英美派”外交官产生的内外环境，分析“英美派”外交官群体的形成及原因，揭示“英美派”外交官的群体特征，展示“英美派”外交官在美援外交中的作为，探讨“英美派”外交官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比较胡适、陈光甫、宋子文等“英美派”外交官在美援外交上的异同等，以期对“英美派”外交官群体与国民政府的美援外交做一综合性考察。

## 第一章

# 初登国际外交舞台的 “英美派”外交官

本章主要考察晚清以来的留学潮流与近代中国职业外交官产生之渊源关系，探讨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上，“英美派”外交官初次登上国际外交舞台争取美援的外交活动及其取得的实际成效，并揭示“英美派”外交官崛起的国际国内环境。

### 第一节 晚清留学潮流与“英美派”外交官之缘起

#### 一 晚清留学潮流之兴起

鸦片战争后，中外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传统的“华夷体系”逐渐向近代条约体系转变，中国传统外交也逐渐向近代外交转型。

国际关系中的近代条约体系起源于欧洲。从法理上来说，近代条约体系建立在主权国家、国际法的基础上，国家之间根据平等原则，以国际条约为基点进行交往。但实际上，近代条约体系主要以西方列强为权势中心，奉行的是强权政治和实力原则（即西方文明标准）。中国被强行纳入近代条约体系后，国际地位遭遇了“双重”失落，一方面由原来的“中央帝国”跌落

为主权国家的成员之一，另一方面又沦落为从属于西方列强的“外围”国家，遭受其侵略和奴役。<sup>①</sup>

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的此种情势，诚如李鸿章所言，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欺凌，“甚至连愚蠢的清政府也认识到，除非中国实行某些现代教育，否则它注定要被帝国主义奴役。中国需要现代训练的工程师、科学家及其他人才，但由于它还没有合适的学校提供高等科技教育，中国学生必须到国外留学”。<sup>②</sup>在此背景下，清政府将留学作为一项国策付诸实施，使留学教育成为国内教育的重要补充手段。同治十一年（1872）清政府派出第一批赴美国的留学生，其后赴欧洲各国的留学生也相继派出。

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又出现赴日本留学的浪潮。及至清末，朝廷推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留学之风更盛，且得到政府的鼓励。正如刘大鹏所观察到的，当时“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于是“天下之士莫不舍孔孟而向西学”；胡适也在1910年6月30日给母亲的信中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唯有出洋留学一途。”<sup>③</sup>

晚清留日潮流对近代中国影响至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的文化史，另一方面又是近代中国的教育史。在辛亥革命以前，不少革命活动是在日本策动的。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物，包括亡命客、留日学生和日本的‘支那浪人’等”。<sup>④</sup>近代中国革命的许多杰出人士，如孙中山、黄兴、陈天华、邹容、宋教仁、廖仲恺、何香凝、章太炎、秋瑾、陈独秀、李大钊、彭湃、周恩来、张闻天等，都曾留学日本。大批留学生东渡日本，缩短了西方文化与中国学子的精神距离。因而，张之洞认为，这种趋势是

① 参见徐新《晚清中国外交：历史冲突中的失落与更新》，袁明主编《跨世纪的挑战》，重庆出版社，1992，第383页。

② [美] 欧文·拉铁摩尔：《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日] 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第1~2页。

③ [美] 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张艳译，三联书店，2010，“序言”第3页。

④ [日] 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286页。

“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sup>①</sup> 甲午战争的惨败，列强的瓜分豆剖，使众多的爱国学子认识到，救亡图存乃当务之急；而出国学习国外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以及文化，则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途径。

## 二 庚款退还与留美兴学

20 世纪初期，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涌向日本留学的壮观景象，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一些美国在华传教士、外交官以及美国政府里的“中国通”认识到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将发生巨变，建议美国政府将多余的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支持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1906 年初，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爱德蒙特·詹姆士（Edmund James）在给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得最大可能的报偿。如果 35 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并且不断扩大这股潮流，那么我们今天一定能够使用最有效的和最巧妙的方法，亦即通过对中国领袖们在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控制，将中国的发展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了。”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学生来美后，“学习美国的制度，结交美国朋友，回国后便会在中国外交中亲近美国……退还庚款是山姆大叔历来所做的事情中最有利可图的。他们将形成一支强有力的亲美力量，任何一个政府或欧洲的贸易团体都不能与之匹敌”，而“这种道义上的影响的扩展……将比任何其他方式获利更大”。<sup>②</sup>

美国政府审时度势，欣然接受这些人的建议。1908 年 5 月 25 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规定自 1909 年起至 1940 年止，将多得的庚子赔款逐年按月退还中国，用于兴办清华学校和资助学生赴美留学。中美双方约定，自 1909 年起，清政府应在最初四年内，每年至少向美国派遣 100 名留学生，如果到第四年派足了 400 名，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 50 名，直到庚子退款用

---

① 转引自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第 96 页。

② A.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New York, 1907), pp. 213-218.

完为止。<sup>①</sup> 庚款兴学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意在同欧洲各国和日本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其用心极其深远，但它支持了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加强了清政府的亲美倾向，也提高了美国在中国的声誉，使中国学生的留学方向转向美国”。<sup>②</sup>

在庚款兴学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留美教育再度兴起，留美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宣统二年（1910）达 500 多人，宣统三年（1911）增至 650 人，其中官费 207 人，自费 443 人。辛亥革命后，特别是 1915 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事件后，中国教育发展模式不再以日本为学习榜样。欧美留学生的大量归国，“强化了直接以欧美为榜样的可行性”，<sup>③</sup> 于是留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形成声势浩大的留美浪潮。截至 1929 年，清华共派出留美学生 1825 人，其间历年赴美的各类留学生达 5362 人，加上此前的留美学生，以及未入美国大学的其他各类学生和进修、考察、学习的人员，超过 8000 人。据留美学生朱庭祺观察：“我国学生留学西洋者，各国中当推美国为第一。”<sup>④</sup>

留美热潮的兴起，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罗志田先生所指出，五四运动后的十年，“思想界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留英美学生的优势日显，逐渐取代过去留日学生的地位；而在高等教育领域，留美学生更渐成主流。越来越多的思想资源直接来自西方，不再转手于日本”，尤其是“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多少象征着一种那时开始显露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的影响上升和日本影响的下降”。<sup>⑤</sup> 从此，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大潮转向英美与俄国。

学者舒新城指出：“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时不与留学生发生关系，尤以军事，外交，教育为甚。”<sup>⑥</sup> 可见，晚清以来留学潮流的兴起，催生了

① 参见蒋相泽、吴机鹏主编《简明中美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第 133 页。

② 刘秀生、杨雨青：《中国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5，第 156 页。

③ 〔美〕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序言”第 10 页。

④ 转引自彭小舟《近代留美学生与中美教育交流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第 25~26 页。

⑤ 〔美〕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序言”第 3~4 页。

⑥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新世纪出版社，2011，第 137 页。

近代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外交官，而“英美派”外交官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当始于辛亥革命后之袁世凯及历届北洋政府。在这一代可数的著名外交官中，有伍廷芳、伍朝枢、陆徵祥、曹汝霖、施肇基、魏宸组、颜惠庆、王正廷、顾维钧等。其中个别外交官，或在清末即开始外交生涯，但作为一代人讲，其诞生当在辛亥革命后。<sup>①</sup>

## 第二节 巴黎和会上“英美派”外交官争取美援之努力

### 一 巴黎和会对于中国的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集团的各主要战胜国都力图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巩固它们在战场上的既得成果。为此，规模盛大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正式召开。出席会议者有27个战胜国和5个新成立国家的代表，它们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希腊、葡萄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sup>②</sup>、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加拿大、巴拿马、秘鲁、厄瓜多尔、乌拉圭、玻利维亚、巴西、古巴、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印度、汉志（今沙特阿拉伯一部分）、暹罗（今泰国）、利比里亚、南非，一些“社会团体”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巴黎和会标榜“公平”、“正义”与“和平”，实际上成了主要战胜国宰割战败国、牺牲弱小国利益的分赃会议，从与会国家的分类以及全权代表人数的分配差异上，即可看出和会的不平等性。与会人数虽在1000人以上（加上家属超过3000人），但会议正式代表则只有70人。苏维埃俄国未受邀请，德国、奥地利等战败国不准出席会议。法国总理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任大会主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

① 参见高克《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外交官生涯片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序”第2页。

② 当时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为南斯拉夫王国。

美国国务卿罗伯特·蓝辛（Robert Lansing）、日本资深外交官西园寺公望、意大利总理维托里奥·奥兰多（Vittorio Orlando）任大会副主席。出席会议的国家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享有整体利益的国家”，即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五大强国，可各派5名全权代表，他们有权出席一切会议。第二类是“享有局部利益的国家”，即中国、比利时、巴西等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的战胜国，可各派2~3名全权代表，他们有权出席与本国有关的会议。第三类是“与德奥集团绝交的国家”，如厄瓜多尔、秘鲁等，可派1名全权代表，他们只能出席涉及本国问题的会议。第四类是“中立国和即将成立的国家”，它们在五强之一邀请下，可就与本国直接有关的问题发表意见。<sup>①</sup>

中国的北京政府和南方的广州政府联合派出一个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他们是陆徵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北京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北京政府驻英公使）、魏宸组（北京政府驻比公使）、王正廷（南方广州政府代表），五人均为全权代表。

“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治的继续。”<sup>②</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传统世界秩序的崩溃和世界新秩序的到来，就其对中国的促进作用而言，它“为中国重新调整她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动力和机遇，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得以参战并进而跻身于国际社会……它激励中国人渴望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此，“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看起来没有对中国自身造成直接性的影响，但是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许多破坏性力量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舞台”。<sup>③</sup>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随美国参战，期望利用这一历史性机遇，改变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期被动受辱的境况。

---

① 参见刘陵、洪育沂主编《国际关系史简编——半个世纪世界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第46~4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915页。

③ [美]徐国琦：《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马建标译，三联书店，2013，第8~9页。